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4~34

2014年7月25日

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剑桥大学 彼得·诺兰 (Peter Nolan) ¹

对于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征分析得最深刻的要数亚当·斯密² 和卡尔·马克思，两人都将深刻的哲学探究与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之经济基础的深入分析结合起来，把社会经济结构看成是从“古老的过去延伸至未知的未来”这一长期演化过程中的综合体系。两人都对整个物种的漫长历程抱有热切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各自的生命不过是倏忽一瞬。

亚当·斯密的著作启发了相信自由市场主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们对斯密著作的认识是粗略的、不全面的 (Nolan,

¹ 感谢张瑾博士建议我撰写本文，也感谢张瑾博士、Stephen Perry 和 Geoff Harcourt 提供评论。

² 参见《道德情操论》 (Smith, 1761) 和《国富论》 (Smith, 1776) 。

2003)。马克思的著作则启发了那些在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政治起义推翻资本主义但告失败的革命者，以及那些在发展中国家推翻政府、建立起共产党领导政权的革命者。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府的解体、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深刻变化、以及发达国家深层的系统性危机，使得人们需要重新评判马克思的智慧遗产。尽管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进行了巨大的体制改革，马克思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然占据重要的核心地位。西方如果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与中国合作克服全球化的共同挑战，就有必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丰富复杂的智慧遗产的真正性质，而不是依赖那些主导西方媒体、充斥在西方政治家观念中的对于马克思观点的认识和曲解。

共产主义元素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成长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双刃剑”。资本主义竞争从古代世界最早出现以来，带来的不仅有众多益处，还有深刻的问题：“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因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创造出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而这个社会就像是一个巫师，已经无法再控制自己用魔咒召唤出来的冥界力量了”（Marx 和 Engels, 1848: 49）。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要管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特征中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使用了黑格尔的一个词“aufhebung”（德语，意指“扬弃”）或“克服”来分析这一过程，即辩证法中正题和反题互动关系的原理。人类通过集体控制自己所创造的体系，来克制自身偏离本物种的异化（即有意识地发挥创造力）：“正如宗教里人受到自己大脑产物的制约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受到自己双手产物的制约”（Marx, 1867: 621）。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毛孔中出现是通过实践（praxis）发生

的，也就是人类有意识地塑造正在变化的历史形势：“革命体现了应当让人类创造的生活条件服从于人类意志力的根本需要，它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指令和掌控，使人类与其生活的环境成为一个整体”（Avineri, 1968: 149）。

在马克思看来，建设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为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人民群众为了共同利益逐渐建立起对政治经济体系的集体控制。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在“第一个工业国家”和“世界工厂”即英国的发展。《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探讨了未来的具体政策。他们在《宣言》中列举出了“在最发达国家一般适用的”无产阶级政府可能采取的几项措施，即“废除土地所有制，将所有租金用于公共目的”、“累进或分级的高额个人所得税”、“废除全部遗产继承权”、“通过国有银行掌握国有资本并且排他垄断，使信贷集中控制在国家手中”、“通讯手段集中控制在国家手中”、“扩大国有工厂和国有生产工具”、“为所有公立学校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Marx 和 Engels, 1848: 74~75）。《共产党宣言》所举具体措施“最惊人的特点”是“不包括任何诸如产业国有化的内容”（Avineri, 1968: 206）。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真正革命性的，它们“只不过是辩证地实现并废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在运作的过程”（Avineri, 1968: 206）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稳步扩大，国家层面的社会经济监管尽管步履蹒跚，却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中包括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逐渐建立起了福利国家的制度。如果我们将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与 19 世纪中叶时做个比较，那么迈向共产主义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进展包括普选权（这一进步受到了马克思的

称赞)、累进税制、免费中小学教育、就医时免费的健保服务,由政府广泛监管交通、通讯、水务、能源和环境,由政府管理的央行控制金融体系,政府全方位控制宏观经济的波动。尽管进展步履蹒跚、并不完美,各国情况也有显著差异,但是人民群众摸索前行,进一步地控制了由其集体劳动创造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社会不公和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英国,19世纪40年代废除《谷物法》时,放任自由主义达到高潮。而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英国的进步已经远远超出了19世纪4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自由市场政治经济。³换句话说,在发达国家,共产主义的元素或萌芽到马克思逝世时已经清晰可见,它们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中产生并且在资本主义自身的框架中逐渐成长。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共产主义理论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废除私有制”(Marx 和 Engels, 1848: 63)。对那些因为拥有财产而享有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受益权可以通过无数种方式将其进行转化并使其得到监管。如果把国有制作为共产主义的必要和决定性特征,将会损害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丰富内涵,也有悖于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毛孔中演化发展而来的思想。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作序时,重点指出“不应特别强调”在1848年原版《宣言》中提出的革命措施,因为“无论在哪里,(《宣言》中)原则的实际应用始终都取决于当时存在的历史条件”(Engels, 1888: 21)。换句话说,不能将共产主义机械等同于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历

³ 恩格斯1892年的著作总结了英国资本主义在1848年至19世纪80年代之间的转型,他写到:“真相是这样:英国的工人阶级在英国的工业垄断时期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垄断(世界贸易)的好处。这些好处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大部分落入了有优先权的少数人的腰包,但即使是占绝大多数的群众至少也能不时短暂分到些好处。这就是为什么自从欧文主义消亡后,英国再没有出现社会主义”(Engels, 1892: 34)。

史条件和资本主义解决其内部矛盾的方式。

发达国家中“所有制的社会特征”（Marx 和 Engels, 1848: 64）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了家族企业巨头的崛起。自那以后，所有权结构从“所有者~管理者”演变为在股市交易股票的股份制。通过这种机制，资本在相当程度上转化成了“共同财产”，也就是“社会所有成员的财产”（Marx 和 Engels, 1848: 64）。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公司已经演变为由管理者控制、股权分散的企业，拥有股份的主要是个人（Means, 1930; Berle 和 Means, 1932）。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个人持股制已逐渐衰落，大公司的所有权现在主要掌握在机构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汇集大众个人储蓄的养老基金（Minns, 1996）。财产高度集中在那些同时为养老基金和保险行业管理大部分资产的机构手中。2010 年，世界最大的 500 家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 64 万亿美元的资金（Towers Watson, 2010），其中前 50 家占管理资金总额的 61%，而且前 100 名的公司中没有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

戈登·克拉克（Gordon Clark）将当前的体系称为“养老基金资本主义”（Clark, 2000）。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则提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场“看不见的革命”带来了“养老基金社会主义”（Drucker, 1976）。无论是个人直接拥有还是通过机构间接拥有，现在发达国家有一大部分人口是大公司的所有者。资本占有高度不平等，而且股市的增长在金融体系中增加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谨慎地写道：“共产主义的突出特征不是废除一般所有制，而是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Marx 和 Engels, 1848: 62）。“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本质自 1883 年马克思逝世后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基础都建立在社会经济形态通过解决内部矛盾而不断演化之上，所

以即使他看到这样的变化也不会意外。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时代见证了资本主义国际特性的猛烈扩张，随之而来的是在全球层面的爆炸性产业集中。如果我们要确保人类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那么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全球监管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然而全球监管仍然处于婴儿期，要对“疯狂资本主义”进行必要的全球监管以解决其深刻矛盾，意味着错综复杂的挑战（Nolan, 2009）。那些从人类的集体利益出发、合作监管全球政治经济的全球机构既是粗糙的，又具有深层缺陷。各国利益的差异使得全球机构面临障碍，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又加剧了这些障碍。尽管已经在各种广泛的活动中建立起了全球市场，人们主要还是在各自的国家生活，有各自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要监管“疯狂资本主义”就必须合作，实现合作的关键就是高收入国家（“西方”）约十亿公民与发展中国家约 60 亿公民（21 世纪晚期将增加到约 80~90 亿）之间的关系。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产业集中与寡头竞争

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企业间的竞争可以类比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所说的“森林中的树木”，即大企业在竞争中不断败给敏捷的新进小企业（Marshall, 1890）。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过程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时代更加强有力，这使产业竞争的世界变“平”了，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有前所未有的机会打败大企业（Seabright, 2005; Friedman, 2006）。另外一种非主流的观点则提出，由于大企业拥有从规模经济和范围效益中获益的机会，资本主义的固有趋势应为产业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非主流观点都是从马克思的分析引发而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巨大的现代产业”取代了小规模生产，“产业富豪、整支产业大军的领袖、现代资产阶级”取代了“产业中产阶级”（Marx 和 Engels, 1848: 42）。《宣言》于 1848 年首次出版，1893 年发行意大利文版本，在此期间，大规模产业的增长已经“使各地产生了集中而强大的众多无产阶级”（Engels, 1893: 37）。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提出了“资本集中定律”，或者叫做“资本吸引资本”。资本集中的驱动力是竞争本身，竞争迫使企业不断投入更多资本到新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的技术应用”当中，以压低生产成本，继而形成进入壁垒：“打竞争战靠的是压低商品价格。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商品是否廉价就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大资本能打败小资本……无论在哪里，扩大产业实体规模都只是起点，以后会更全面地组织多人集体劳动，也使实体的物质激励力量得到更广泛发展——换句话说，是要把那些以惯有方式开展的孤立生产过程逐渐转变成社会联合式的、科学安排的生产过程”（Marx, 1867: 626~627）。

最近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为检验对比分析法的预测特性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20 世纪大部分时期都存在的那些阻碍市场力量运行的掣肘已经去除。这个时期见证了资本主义史上最具爆发性的并购节。在每一个产业领域，都有为数不多广为人知的几家公司开始占据各自行业的“制高点”，占领了全球市场总额的一半或更多份额（Nolan, 2012）。这是产业集中的“冰山”上看得见的部分。不过，来自这些领先系统集成企业的压力自上而下传遍了整个供应链，迫使它们的供应商企业也大量整合，继而又给供应商自己的供应链施加了沉重压力（Nolan 等人，2007）。结果，在产业集中的冰山看不见的部分——“水下部分”，也出现了全球产业的高度集中。

这个出现于全球商业革命期间的产业竞争世界不是“平”的，而是极其不平等的。全球商业革命 20 多年后的如今，商业力量集中在总部位于高收入国家的少数企业手中。在现代行业领域，研发是长期竞争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英国商业、企业与监管改革部（BERR）编写对于全球研发支出的年度调查报告。该部 2008 年的报告（《2008 年研发计分榜》）中包括了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 1400 家企业（G1400）（BERR, 2008）。这些企业 2007 年的研发支出总额为 5450 亿美元，构成了全球技术进步投资的主要部份。前 50 家占这 1400 家企业研发投入总额的 45%，前 100 家占 60%，后 100 家占不到 1%。换句话说，在全球化时代，少数几个高科技行业中的 100 家左右企业处于技术进步的中心。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供应链上游的整个部分都持续存在激烈的寡头竞争，这带来了我们经历过的最快的技术进步。G1400 的名单上主要是少数几个国家的公司，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公司占总数的 80%。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这五个欧洲小国的总人口只有 4200 万，却有 132 家公司名列 G1400。而“金砖”四国的总人口有 25.66 亿，却只有 34 家公司跻身 G1400。发展中国家整体来看，虽然其人口占世界的 84%，进入 G1400 的却总共只有 37 家公司。

资本主义的动态与技术进步

激烈的全球寡头竞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的这个过程推向了新的高点：“资产阶级在不足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世代创造的生产力加起来都更宏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蒸汽轮船航海、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

垦、运河的开凿、大量人口法术般从地面上涌现——之前哪个世纪哪怕有过一丝预感，料想到社会劳动中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Marx 和 Engels, 1848: 48）。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强调了技术进步在资本商品行业中的关键作用——“用机器的方式生产机器”（Marx, 1867: 第 25 章）。在最近的全球商业革命时代，若干资本商品发生了革命，其中包括商用飞机、汽车卡车、以及电信、采矿、油田、发电配电、取暖、通风和冷却设备。这些产品的技术进步都降低了能源密度，改进了操作便利性和可靠度，提高了安全、产品寿命和维护的便利性。

最重大的创新出现在信息技术行业。在信息技术的每一个子领域，激烈的寡头竞争都向前推动了创新。在 2010 年世界研发支出最多的一千家公司（G1000）排行榜上，IT 硬件行业的研发支出是所有行业中最多的，总额达到 1350 亿美元，占 G1000 公司研发支出总额的 24%（BIS, 2010）。⁴ G1000 中来自这个行业的一共有 226 家企业，其中近五分之三（127 家）是美国企业。G1000 中的“软件及计算机服务”子领域总共有 74 家企业，其中前五家企业的研发支出占该子领域的 57%。这个领域的前十家企业中有八家是美国企业，包括超级产业巨头微软、IBM、谷歌和甲骨文。“硬件”子领域共有 152 家企业，其中前十家的研发支出占该子领域的 45%。这个领域的前十家企业中有五家是美国公司（英特尔、思科、摩托罗拉、惠普和高通）。在 IT 行业的每个细分市场中，都有少数几家全球巨头企业在进行白热化的寡头争夺战，竞争的核心就是创新。例如服务器领域的 IBM 和惠普，软件包领域的甲骨文和 SAP，智能手机操作系统领域的谷歌~安卓与苹果，半导体生产器械领域的 ASML 和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

IT 革命构成了全球商业转型的中心，它使全球公司的性质发生了

⁴ 这本年刊于 2010 年停刊。

转变，使得关键职能部门有可能集中管理，并且可以转变核心系统集成公司与组成其供应链的“外延公司”之间的关系。它使得全球企业的边界可以变得模糊，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新的形式分离。IT 革命的产物深植于制造业之中，从汽车到电梯无所不在。这场革命既转变了包括银行、零售、休闲、娱乐和广播在内的服务业，也转变了人际关系和政治生活，还有力地影响了国际关系⁵ 和军事技术⁶。

资本主义的全球特征

资本主义的国际特征是马克思所分析的核心：“资产阶级通过一切生产工具的快速改进，通过沟通方式的高度便利，把所有民族都推到了文明之中。商品的低廉价格是资产阶级的重磅炮弹，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强烈的仇外之心。资产阶级强制所有民族迫于灭亡之痛而采纳它的生产模式，迫使这些民族推行它所称的文明，即自身变成资产阶级。简言之，它按自己的样貌创造一个世界”（Marx 和 Engels, 1848: 47）。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殖民主义是落后的基本原因，伴随殖民主义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例如参见 Bagchi, 1982; Baran, 1957; Frank, 1967）。事实上，马克思自己对殖民主义影响的

⁵ 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任命埃里克·罗斯 (Alec Ross) 为“创新高级顾问”。埃里克牵头制定了美国政府“21 世纪治国之道”的举措：“因特网改变治国之道的规则……社交媒体为政府与人们直接打交道提供了有力工具，使双方的联系更本地化、更自然。外交通常以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式互动来开展……21 世纪外交的重大创新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使用连接技术和社交媒体网络，所有国家的人们能就我们时代的紧迫问题彼此互动……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提倡普及和采用连接技术作为人类赋权和进步的工具。”（Ross 和 Scott, 2011）

⁶ 网络战争的发展剧烈改变了 21 世纪战争的面貌。

观点与此颇为不同（例如参见 Marx 和 Engels, 1952; Avineri, 1969）。

“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反对殖民主义。然而事实上，尽管马克思谴责殖民列强的虚伪和暴力，但也指出殖民主义是一种进步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由“亚细亚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得到发展。这继而又可以促成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19 世纪 40 年代时英国的大炮击碎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开始接触凡尘世界。旧中国延续下去的首要条件就是完全的隔离，这一隔离因为英国的缘故走到了尽头。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瓦解，这是必然的，好比任何小心保存在密不透风棺材中的木乃伊一旦接触到外界空气就会瓦解一样”（Marx, 1853: 4）。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益处的看法直接得残酷。例如，19 世纪 40 年代，由毕若（Bugeaud）将军带领的法国军队暴力征服阿尔及利亚（例如参见 Sessions, 2011），开启了法国在那里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恩格斯对法国打败土著抵抗是这样写的：“总体来说，我们（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是，俘获了阿拉伯酋长真是大幸。贝都因人的抗争毫无希望，尽管如毕若之流的残暴军人发动战争的方式应受到严厉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至关重要而且实乃幸运……毕竟，现代资产阶级身后跟随着的是文明、工业、秩序和至少是相对的启蒙，他们可比野蛮社会的那些封建领主或打家劫舍的强盗更为可取”（Engels, 1848）。尽管马克思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由固步自封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统治这一观点很有问题，但是确有充分证据表明伴随殖民主义而来的是大范围的经济进步（例如 Allen 和 Donnithorne, 1957; Warren, 1980）。

国际资本主义的进步影响在后殖民时代仍在继续。在最近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构建起了全面的商业体

系。从 1990 年到 2009 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总量从 5250 亿美元增加到 4.9 万亿美元，占 GDP 比例从 14% 上升到了 29%。发展中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企业（UNCTAD, 2010）。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年均 GDP 增长从 1980~1990 年的 3.2% 加快到 1990~2000 年的 3.9%，2000~2010 年达到了 6.4%（WB, 2004: 184 和 2012: 216）。

四海相连的共通世界在最近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一合乎逻辑的结果正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步特征的观点的中心：“不断扩大产品市场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走遍整个地球。它必须到处筑巢、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发世界市场，给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赋予了共通世界的特征……原有的那种地方和国家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方面的交汇往来和国家之间的普遍依存。不仅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个国家的知识创造成为了共同财产”（Marx 和 Engels, 1848: 46）。

阶级斗争

马克思将阶级斗争视为推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心力量：“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封建社会的废墟中萌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除阶级对立。它只是建立了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和新的斗争形式来取代了旧的”（Marx 和 Engels, 1848: 40~41）。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 1892）深受 19 世纪中叶英国极度贫困的影响，马克思非常担心机器生产下劳动分工所带来的非人性化后果，这个后果是“对个人生命最根源的打击”（Marx, 1867: 363）。即使“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和新的斗争形式已经取代了旧的”，但是在理解如今全球政治经济的演变时，阶级关系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阶级结构的主要轮廓清晰可见。

现在出现了一个突出的全球管理精英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位居全球公司的高层位置，人数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收入却异乎寻常的高。米里安诺维奇（Milianovic, 2007）使用购买力平价（PPP）汇率，并且结合跨国收入分配指标，估算出全球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 0.64，全球前 10% 人口的收入占全球的 50%。这种程度的不平等“在世界史上可能是无可比拟的”：“如果这样的极度不平等存在于较小的社区或是民族国家之中，管理当局会发现它太不利于稳定，无法置之不理，否则可能爆发革命或暴乱”（Milanovic, 2007）。如果用官方汇率将国家收入数据换算成同样标准，那么 1998 年的全球基尼系数不低于 0.8，前 10% 的人口占全球总收入的 68%。家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是 0.89。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的高收入国家占全球总家庭财富的 88%。前 1% 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球家庭财富的 40%，前 5% 的家庭拥有 71%，前 10% 的家庭拥有 80%，而后 50% 拥有总额的 1.1%，后 80% 拥有 6.1%（David 等人，2008）。

在全球企业价值链上游工作的那些人有共同的文化。全球巨头公司的领袖常常选自公司总部以外的国家。全球精英只占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但世界已经通过许多标志注意到了他们的特殊地位。他们使用一种共同语言——英语。这个群体成员的主要居住地经常从一国搬到另一国。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读同样的报纸（《金融时报》），住同样的酒店。他们利用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与各自的公司连接，保持与整个公司的沟通。他们购买同样的全球奢侈品牌，他们的子女上同样的国际私立学校，在同样的精英大学完成教育。他们不止在一个国家拥有居所，住房与普通人的房子隔开。无论是在公司层面还是在社会群体方面，他

们与某一个国家的牵绊越来越少。

跨国咨询公司预计全球的阶级结构会出现巨大转型：“按照目前趋势，全球中产阶级将很快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不过，这些预测大部分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经过谨慎分析。世界银行的结论是到2030年，全球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⁷将达到30亿，相比之下，2000年只有11亿（World Bank, 2007: 73）。不过，他们估计“贫穷”人口的绝对数量将从2000年的50亿增加到2030年的52亿。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30年后的今天，“富裕和中等收入”人口加起来占世界人口不到五分之一，到2030年很可能占不到五分之一（World Bank, 2007: 73）。一些考虑更全面的估计称“全球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比例到2030年会更小。伯索尔（Birdsall）估计，日收入超过10美元的“富裕和中产阶级”在印度占总人口的不到5%，在中国约占总人口的6%（Birdsall, 2011）。像墨西哥和土耳其这样的中上收入国家，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印度的四倍。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等和富裕人口加起来只占各自总人口的20~30%（Birdsall, 2011）。换句话说，中国和印度的全球“富裕和中等收入”群体不太可能在2030年前超过30%。

在高收入国家自身内部，资本主义全球化给阶级结构带来了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进口消费品的实际价格下降，资本主义全球化帮助提高了实际收入，也通过技术进步为大部分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改善。⁸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帮助加剧了不平等。20世纪70年代后的资本和产品市场自由化，使那些“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开放了庞大的低价劳动力队伍。资本向穷国迁移，穷国向富国出口产

⁷ 他们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收入在4000~7000美元（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美元），将富人定义为收入超过七千美元。全球穷人的收入不到四千美元。

⁸ 技术进步对大众福利的影响几乎不可能衡量。

品和服务，全球劳动力市场主要通过这些方式实现了一体化。由于“一价定律”的作用，这种一体化在工资和工作条件国际平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些压力大大加深了技术变革的影响，使得一大批有保障的、大多有工会组织并且要求适当技能的办公室白领全职职位，被那些低技能、无保障、无工会组织的服务业兼职职位所取代，例如在餐馆、娱乐、休闲服务、零售和家政行业的职位。换句话说，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非正规”行业在就业中的占比大幅增加。收入分配方面，前 10% 人口的收入占比从 1950~1980 年的 33~34%，增加到 2008~2010 年的约 48~50%，与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的比例大致相同 (Piketty 和 Sasz, 2012)。如果按这些趋势推断未来，那么发达国家阶级结构演变的前景将十分黯淡。技术变革强化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逐渐统一，但是这种统一远未产生阶级利益的同质化，反而加剧了贫富国家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穷国的工人被认为损害了富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受那些耸人听闻的大众媒体挑唆，这在发达国家形成了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甚至种族歧视政治的广泛基础。

在发展中国家，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是人民群众获得的巨大进步。生活水平在每日二美元以下的赤贫人口比例从 1981 年的 70% 减少到今天的 43% (World Bank, 2012: 72)。现在发展中国家有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这对社会关系和人生机遇来说具有深远意义。识字、卫生、电气化和信息科技普及都有快速进步。饥荒已经基本消失。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寿命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56 岁提高到今天的约 66 岁。

而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除了大众福祉的巨大进步外，还有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中国一直处于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前沿。据官方估计，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 0.28 增加到 2005 年的 0.5 (Nolan, 2009: 140)；

据非官方估计，现在的基尼系数达到了约 0.6。据估计，中国前 1% 的人口拥有全国家庭总财富的 67%，而前 0.1% 的家庭拥有 46% (BCG, 2009)。换句话说，中国约 13 亿总人口中的约 130 万人拥有家庭财富总额的几乎一半。

全球各商学院在振振有辞地谈论“金字塔底的财富” (Prahalad, 2004)。虽然发展中国家贫穷人口的比例降低了，但是生活水平在每日二美元以下的全球赤贫人口的绝对数量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在 25 亿左右 (World Bank, 2010: 92)。中国生活水平在每日二美元以下人口的占比从 1981 年的 98% 下降到了 2005 年的 36%，但是 2005 年的绝对数仍然是 4.74 亿。印度生活水平在每日 2 美元以下人口的绝对数从 1981 年的 6.09 亿上升到 2005 年 8.28 亿 (占人口的 76%) (World Bank, 2010: 92)。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占世界的 83% (World Bank, 2012: 48)。在可预见的未来，贫穷的“劳动力后备军” (Marx, 1867: 628~640) 将有力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中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大型工厂就业，为全球客户从事简单重复的产品组装工作。工人们的确“在生命的最根源受到了打击”。还有更多人处在非正规行业，在几百万家小企业中工作。在“非正规”行业工作的非农业劳动力队伍在非洲占到 75%，拉美为 58%，亚洲为 40~60% (国际劳工组织, 2002)。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部分劳动力构成了“劳动力后备军”，在“非正规行业”中就业，拿着一成不变、勉强糊口的工资。这个行业的特点是，“无论是在家、在血汗工厂或是在户外独立工作，工作都是临时的、不固定的按件计酬，没有任何合同权利或集体组织” (Breman, 2009)。据估计，发展中国家有两亿多名 5~14 岁的未成年人在工作，其中“至少有 1.11 亿从事的是受剥削的危险工作” (ILO, 2002)。在“非正规”的采

矿、制造、建筑、运输和服务业的工作条件以及相关的家庭生活条件一般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首版发行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化的早期）中描述的鲜有不同（Engels, 1892）。其中的大部分企业都由所有者管理，劳资之间尖锐的对立关系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相仿。

如今的高收入国家都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经历过严峻的阶级斗争。全球资本主义如今到来，就好比是欧洲的“1848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仍认为严格限制的选举权是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必不可少的。《1832年改革法》只略微扩大了英国选举的范围（选民人数从43.2万增加到65.2万），其主要结果是“使议会向新的产业资产阶级代表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更大地敞开大门，但它最重要的结果是明确规定了此后这些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决定性因素”（Engels, 1892: 28）。直到1918年，英国才实现全体成人男子都有选举权（Therborn, 1977）。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爱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之类的观点主导了英国的政治发展。法国大革命令欧洲资产阶级深深见识到欧洲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令人生畏。伯克对革命的极端和天真感到惊愕：“一味沉迷于最华丽的想像是虚伪的……（照）这些教授（的说法）……这要么是一场战争或革命，要么什么都不是……这种人对自己关于人类权利的理论如此着迷，以至于完全忘掉了人的本性”（Burke, 1790: 155）。他深深畏惧巴黎的那些革命俱乐部的毁灭力量：“在所有这类会议上，越是大胆、暴力、背信弃义的建议，越被标榜为才华横溢。人道主义和同情被嘲弄成迷信和无知的果实，对个人的温和被视为对公众的背叛”（Burke, 1790: 160~161）。伯克强烈意识到不只是法国的政治体系中存在缺陷，英国也一样：“旧体制的错误和缺陷清晰明显，这

无需多少才能即可指出” (Burke, 1790: 280)。不过,他认为政治改革比政治革命可取得多:“以为任何人都应该敢于拆毁一个多年来原本在任何可容忍的程度内都符合社会共同目的的体系,或者在眼前尚无已被证明有用的模式或形式时就重建这个体系,对这种看法要无比谨慎……愤怒和狂暴会在半小时内摧毁由审慎、深思和远见用一百年建设的成果” (Burke, 1790: 151~152)。针对改革可能耗时多年的批评,他是这样回答的:“毫无疑问,这有可能而且也应该(耗时多年)” (Burke, 1790: 280)。他认为拥有财产的人有治理社会的优先权,这明确表现出他的保守:“至于说管理国家时人人应当共享权力和权威、共同下达指令,我必须说这不属于人的直接原始权利” (Burke, 1790: 150)。

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在《大转型》一书中观察到:“在英格兰,必须禁止工人阶级投票成了宪法不成文的规定…… (1848 年) 的宪章运动者争取权利去关停那些压迫人民生活的市场工坊,但是只在做出糟糕的修改后人民才被赋予了权利” (Polanyi, 1957: 226)。全球治理的民主体系应是一个由全世界的成年人投票选举出全球议会的体系。全世界底层 80% 的人口加起来只拥有总财富的 6%, 而顶部 10% 的人口却拥有世界财富的 85%。可以想像,前者支持的很多政策可能与后者支持的迥然不同。

金融与实体经济

《资本论》第三卷有一大部分专门对货币和信贷的本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做了大量但未完成的调查。这个领域最有力地显示,通过集体劳动创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人类就像是巫师,“召唤出了失控的冥界力量,但是却对这一力量失去了控制”。“信贷体系加速了

生产力的实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历史使命是将这些新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提升到一定的完美程度。同时，信贷加速了这一矛盾，即危机的猛烈爆发，从而也加速了旧有生产方式的瓦解。信贷体系的两个内在特征是，一方面发展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通过剥削他人劳动来丰富刺激手段，使之达到最纯最大的赌博和欺诈形态，并逐渐减少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数量；另一方面，构建过渡到新生产方式的形态。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性质，使信贷的主要代言人，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混合特点：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Marx, 1894: 441）。

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见证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资产泡沫，货币以五花八门的形式大幅增加，刺激了泡沫的产生。由于投机活动在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中推动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使得资产泡沫能自我强化。资产泡沫影响了几乎所有资产，包括股票、房地产、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债券和艺术品。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是高收入经济体信贷爆炸性增长的基础，也为投机和当前消费提供资金。美国的家庭债务水平无休止地上升，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60% 增加到 2004 年的 120% 以上。全球金融体系现已跨越国界深度整合，程度甚至远超过生产体系的整合。大量债务被重新打包出售，意味着债务在整个经济的分布要纵深得多。这种情况有助于稳定，增强了金融体系安全渡过相对较小规模危机的能力，但也意味着一旦大型金融危机爆发，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更容易受到影响。

在从国家为主的市场过渡到全球市场的同时，国际监管治理并未加强。本应指引全球金融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流动性海洋中的无舵船”。全球金融体系飞速开发出无比复杂的工具，以至于没人懂得如何监管整个体系，即使以为政治机制的存在就是为了

监管，这进一步加剧了监管机构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相信建立在私有银行基础上、无监管的金融市场能自我矫正。金融危机推翻了这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2008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霍斯特·科勒（Horst Kohler）就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发表了令人绝望的论断，将自由化比作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作法自毙的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造出的怪物：“由于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及其可以利用大量负债、少量资本进行交易的原因，使得这只怪物得以成长……这场危机唯一的好事就是让业界任何有头脑和责任心的人都清楚明白，国际金融市场已经长成了一只必须被打回原位的怪物。”马克思对金融集中的评论完全适用于当今时代：“谈到集中！信贷体系的焦点是所谓的国家银行及其周围的大型贷款提供方和高利贷者，构成了巨大的集中，带给寄生阶级超强的力量，让它们不仅定期地掠夺产业资本家，还以最危险的方式干预实际生产——而这帮人对生产一无所知，与生产也毫无关系”（Marx, 1894: 544~545）。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五年来，面对高收入国家之间以及高收入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深刻分歧，全球金融监管只取得了缓慢进展。在中国，“纾困方案”的主要部分被导入到实体基础设施资产中。在西方，“量化宽松”的主要后果是资产价格泡沫，富人不合比例地从中受益，只有一小部分信贷被导入到实际投资中。⁹

环境

马克思像大部分19世纪的作家一样，赞赏自我意识很强的“能干

⁹ 据估计，英国的金融流动总量只有15%进入投资（Turner, 2013），而美国占人口5%的富人获取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40%的利益（Tett, 2013）。

技术人” (homo faber)，“能干技术人”使自然按自己的指令转变，“自然力的征服”、“整个大陆的开垦”、“大量人口法术般从地面上涌现” (Marx 和 Engels, 1848: 48)。雷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 在《寂静的春天》(1962) 一书中警告，如果人类继续将自然当做资源去开采，而不把自然看成是复杂的、包含人类在内的活生生的生态系统，那么可能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后果：“有哪个文明在对生命发动无情战争时能不毁灭自己，也不丧失被称为‘文明’的权利？……‘控制大自然’这个说法是从骄傲自大中构思出来的，它产生于尼安德特人时期的生物学和哲学，当时人们以为自然界是为人类的便利而存在的”。她的担忧成为了现实。

世界自然基金会构建了一个地球生命力指数 (Living Planet Index)，以此追踪全球 1313 种脊椎动物的数量 — 包括鱼、两栖动物、爬虫、鸟和哺乳动物，结论是从 1970~2009 年，该指数下跌了约 30%。这种全球趋势表明，我们正在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侵蚀自然生态系统。哈佛大学生态学家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Wilson) 警告说，如果当前物种灭绝的趋势持续下去，到本世纪末人类将住在一个“孤独的时代”。

高收入经济体锁定在一种生产和消费的模式中，恣意挥霍化石燃料。这个模式的核心是用卡车和汽车运送人和货物的体系。美国每一千人平均拥有超过 800 辆机动车，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只有不到 50 辆。高收入国家人均消耗 5400 公斤 (石油当量) 的一次能源，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消耗 1400 公斤，低收入经济体人均消耗 500 公斤。1800 年以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据估计为百万分之二百六十体积浓度 (260ppm)，2005 年增加到了 397ppm；如果不严加控制，2100 年预计会达到 800ppm。如果发展中国家走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老路，即使技

术快速进步，避免灾难性全球变暖的机会也很渺茫。

共产主义与公社

马克思著作中“公社”与“共产主义”这两个词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1843）中提出“真正的民主”是一个不再将个人与社会并列对比的社会。他第一次使用“共产主义实质”这个词：“公民社会受政治行为推动而分解，必然是因为共和体（das Gemeinwesen）——个人存在于其中的共产主义实质（das kommunistische Wesen），也就是公民社会正在从国家中脱离出来，或者因为政治国家只是它的抽象形式”（译自 Avineri, 1968: 34）。在《批判》中，“公社”一词马克思最初用的是“Kommune”，它来自于法语“commune”，但马克思后来替换成了“gemeinwesen”，“一个不错的德语古词”（Engels, 引自 Avineri, 1968: 34）。gemeinwesen “既指公共事务（res publica）和较狭义的共和国（republic）双重意义上的共和体（commonwealth），又指人的共同、普遍本质和‘公社’（commune）……这个词有力显示马克思认为人类克服公我和私我之间的对立差异而成为一个整体的思想”（Avineri, 1968: 34~35）。1871年的法国革命者对他们新成立的政治结构有一个著名的称谓——“巴黎公社”，并将他们自己叫做“社员”。

“公社”的思想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都占据重要的中心地位。毛主席热烈支持“公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形态来克服群众和国家之间的脱节。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马克思论述1871年巴黎公社的著作为对象的研究占据重要的中心地位（Marx 和 Engels, 1961）。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册中包括一长段摘自马克思著作《论法国内战》的篇

幅 (Marx, 1871: 187~268)。马克思公开欢迎巴黎公社。对他来说，“公社”象征着群众自行掌管国家的观念：“公社 — 社会重新吸收国家权力，将权力作为自己鲜活的力量，而不是作为控制和制服社会的力量；人民群众自身重新吸收国家权力，形成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镇压者的有组织力量” (Marx, 1871: 250)。

马克思再三警告无产阶级在社会经济条件成熟前不要过早起义。他在 1847 年的著述中写到：“如果历史进程中那些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废除、因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创造出来，那么即使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它的胜利也只是暂时的，只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片刻（就像 1794 年一样）”

(Marx, 发表于《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 年 11 月刊，引自 Avineri, 1968: 191)。马克思再三警告：试图以纯政治手段实现的共产主义革命最多不过是实现形式上的平等主义，这种革命没有意识到由资本主义自身创造的、正在发展的公民社会提供了新颖的可能。

尽管马克思公开热烈支持 1848 年和 1871 年的革命，他也强调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盲动”颇为不同。在“盲动”中，“无产阶级试图在群情激愤时直接实现目的” (Marx 和 Engels, 1848: 89)。的确，马克思担心暴力地、过早地、投机地攫取权力会有一种“必然的反动特征”，这是“灌输最简陋的普遍禁欲主义和社会平均主义” (Marx 和 Engels, 1848: 89)。马克思私底下并不鼓励 1871 年的革命，他认为巴黎公社只是一场政治革命，一场“盲动”，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因为在法国发生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这只不过是反常条件下的城市起义，公社的大部分人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Marx, 1881: 293)。1893 年，恩格斯这样反思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法国的工人群众无论是经济进步还是精神发展都

尚未达到可以重组社会的阶段”（Engels, 1893: 37）。在发表《法国内战》册（1871）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时，马克思以前的著作基本全部停版。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的名字“几乎在一夜之间传遍世界，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文献，而是因为他与一场他反对的起义联系起来。他已经预见并预测到这场起义的失败，发动起义的人不是他的信徒，而且据他的看法，这些人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Avineri, 1968: 243）。

尽管马克思只简短讨论了现代世界中农村公社的组织形态，但是他的观察对发展中国家共产主义的未来具有深刻的意义。

1881 年 2 月，俄国革命党人兼 1882 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译者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写信给马克思，¹⁰ 问他俄国公社是否注定会在农村资本主义的手中消亡，如果是的话，这对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公社注定消亡，社会主义者剩下能做的就只有不太精确地算着俄国农民的土地会在几十年间转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俄国的资本主义会在几百年间达到近似西欧已经实现的发展水平。然后他们的任务将是只在城市工人中进行宣传，而公社解体后被扔到大城镇街头找活儿干的农民大潮会不断淹没这些城市工人”（Zasulich, 1881）。

马克思对如何回信深感苦恼，在几个星期内连写了三封长篇草稿并一再修改（Marx, 1881b）。他最终的回信简短谨慎，但说他相信公社可能是“俄国社会改造的支点”（Marx, 1881b）。马克思的几封草稿曾经遗失，但在 1911 年被找到并于 1924 年出版，出版的时机至关重要，此时正是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工业化大辩论”的时期，农业机构的作

¹⁰ 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到底是不是 1882 年俄文版的译者并不清楚，普列汉诺夫（G. V. Plekhanov）后来声称是他译的。

用处于重要的中心地位。¹¹ 这几封不同的草稿有着大量涂改，内容多处重合。马克思不断再加工，对不同草稿中的说法做出轻微修正，流露出被这个问题引发的焦虑心情。

马克思在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件草稿中 (Marx, 1881b) 认为俄国农村发展有两条可能的道路。第一条是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即废除公有制，“农民中稍富裕的少数人形成中间阶级”，“同时大部分人是无产阶级”。不过由于俄国农民阶级的特性，另一条道路也成为可能：“仅在欧洲，它就已经保存下来，不是作为分散的碎片……而是成为遍布一个庞大帝国的、几乎占主导地位的大众生活形态。虽然它在土地公有制中有着集体所有的天然基础，但其历史背景——与资本主义生产同处一个时代——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共同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既能结合资本主义体系的积极成果，又不必经历资本主义体系严苛的盘剥。公社可以逐渐使用尤其适合俄国实体环境的、由机械辅助的大型农业来替代零星分散的农业，因此它可能成为代表现代社会走向的经济体系的直接起点” (Marx, 1881b)。马克思担心有一个使俄国农业公社“走向衰弱的特点”是公社之间孤立隔离、不相往来。尽管不是所有公社都有这样的特征，马克思还是警告“在有这样特征的地方多少会导致形成中央独裁凌驾于公社” (Marx, 1881b)。他认为这个障碍可以“毫不费力地”移除，只要“用公社自己选举的农民大会来替代政府机构‘乡’ (volost) 即可，¹²——农民大会是为农民自身利益服务的经济政治团体” (Marx, 1881b)。

¹¹ 回信草稿在这么重要的时候出版，对集体化的支持又这么明显，可能使人怀疑它们是被精心伪造的。不过即使是最猛烈抨击苏联集体化的人罗伯特·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 也不怀疑其真实性 (Conquest, 1986: 22)。

¹² 每个“乡” (volost) 包括几个农民公社，由年长的农民和被当地官员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 (Shanin, 1984: 12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 1882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俄语译本作序时，再次提到马克思给维拉·查苏利奇的回信草稿中提出的问题。他们确认了俄国发展的两条可能道路。第一条是走北美发展的道路：欧洲移民“与北美的大型农业生产相契合……整个政治体制的基础——即农民中的中小土地所有者，被大农场的竞争一步步打垮；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无产阶级和高度的资本集中第一次在工业地区发展起来”（Marx 和 Engels, 1882）。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尽管资本主义农业在俄国有所发展，“超过一半的土地仍是共同所有”，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俄国的农村公社（*obschina*）尽管严重受损，但它作为一种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形式，是否可以直接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呢？或者相反，它是否必须经历与西方历史演进一样的解体过程呢？”他们给出了命运性的、但经过谨慎界定的答案：“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运动的讯号，让双方实现互补，那么俄国当前的土地公有制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Marx 和 Engels, 1882）。

马克思是在临去世前身体和精神都饱受压力¹³的情况下写下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件草稿的，这些草稿于 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强化了马恩序言中的观点。即使以这种小心验证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序言也为 20 世纪发展中国家“先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以及革命后农村人口的集体化提供了重要养分（Nolan, 1988）。

共产主义与中国

西方如果要与东方卓有成效地合作，成功建设全球机制、以满足全人类（“全天下”）的共同利益，就需要做出深刻调整。西方需要更好

¹³ 马克思身患重病，夫人珍妮（Jenny）又于 1881 年 12 月过世。

了解世界大部分公民看待世界的方式。近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敌意稳步增加。部分原因是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¹⁴ 包括大众媒体、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内的西方主流思想界对“共产主义”这个与马克思本身观点没什么关系的词语的认识很简化，他们的观点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事实上，“共产主义”一词有多种迥异的定义，都各有道理，大部分定义可能与前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类型有根本的不同。

在中国本土，1921年中国共产党（CPC）成立时，对如何翻译“communism”一词有着不小的争议。中国共产党决定译成“共产主义”，中文字面意思是“财产共有的主义”；并将“communist party”译成“共产党”，中文字面意思是“财产共有的政党”。不过，也有人建议将来源于法语“commune”（中文是“公社”）的英语“communism”译成其他词，包括“共同主义”、“共享主义”和“社团主义”。也有建议译成“大同主义”的，“大同”这个词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思想，意指“天下大和谐”。将“communism”译成“大同”表明社会将追求“公益”或“公利”当成至高无上的目标，又并不指明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特定手段。¹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声明：“所有过去的历史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是为少数人谋利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Marx

¹⁴ 不过，敌视日益增加，也因为西方对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急剧变化的前景感到害怕，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都得到增强。这一进程将结束世界历史中相对较短的一个时代，18世纪晚期英国的工业革命预示了西方约200年的全球支配地位，正是这个时段的开端。

¹⁵ 卢梭不懈地与这个观念做斗争。在《社会契约论》和《政治经济学》中，他谈到了“公利”、“公益”、“普遍意志”、“所有人的意志”、“公共意志”、“公共利益”和“大社会”。最终卢梭将大“普遍意志”至高无上的地位看作是“公共经济的第一原则和政府的根本原则”（Cole, 1993: xliii）。不管如何定义“公利”，卢梭对“公利”的深切关注是他的著作在中国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和 Engels, 1848: 58)。追求“天下公利”（包括东西方）的“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可能都会赞同的哲学目标。

结论

自人类文明开端以来，资本主义竞逐利润的自由一直处于人类进步的核心，不过这种自由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巨大益处，又有深刻矛盾 (Nolan, 2007)。在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前进的步伐达到了新的高点，技术凭借竞争这只无形之手的刺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已形成寡头垄断的巨头公司激烈争夺在全球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引领了前进的步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心矛盾特征的理解比其他任何人都深刻。马克思一生都受到“实践” (praxis) 和“扬弃” (aufhebung) 这两个核心概念的指引，在这些概念中，由人民群众控制他们共同创造的世界。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少数人的政治“盲动”远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合理道路，反而表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还没有完全为其中的共产主义奠定好基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今天绝非无关紧要，西方和中国在试图应对全球资本主义为各自和双方带来的挑战之时，可以一起向马克思学习。

在最近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中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动态特征达到了新的高点，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益处。不过，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加深了，其中包括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对自然环境的威胁，全球商业革命的挑战、全球阶级结构的不平等、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本质，后三个因素马克思全都预见到了。他相信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传播将消弭国家间的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告“劳

动者无国家”，并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发出了响亮的号召：“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Marx 和 Engels, 1848: 71 和 96）。事实上，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一直在相互强化。未来时期的中心议题之一将是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双方往来的结果在决定世界是否能和平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刻矛盾方面至关重要。如能和平解决这些矛盾，将能引导人类蹒跚走向共产主义，避免迈向一场用网络和核武器、¹⁶ 而不是用剑和矛打响的新伯罗奔尼撒战争。

如果人类要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就必须建立全球机制来控制不受约束的全球资本主义这只“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不过，这样做既需要国家利益常有分歧的各国之间合作，也需要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群体之间合作。富裕国家群体的很多利益是相同的，但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分歧。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参考框架或身份根源不是“全球”；除了家族和宗教以外，他们主要的身份根源是“国家”，这也是他们表达政治意见的主要论坛。尽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越来越国际化，但是公民和各国政府的国家利益仍是一股重大力量。

人类面临的这些挑战，是人们自身主要通过经济体系表现出来的有目的活动所带来的产物，靠人类的集体力量能解决这些矛盾。人类可能会因为受到面临挑战之深远程度的震动而采取必要行动，以确保人类物种的生存。人类除了竞争和破坏的本能，还有互相合作的达尔文物种生存本能。或许只有在即将来临的“最终时刻”，才能最终迫使人类摸索出构成 21 世纪共产主义实质的全球合作方案之路。当人类俯瞰深渊时，“夜幕”的降临可能是最后一下脉动，促使合作方案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诞生：“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夜幕降临时才张开翅膀”

¹⁶ 人类仍受到核战争的威胁，要了解对这一威胁令人心惊的看法，参见 Schlosser, 2013。Wang Lixiong (2008) 提供了一个末日核灾难可能发生的高度真实情景。

(Hegel, 1952: 13)。东西方合作监管全球资本主义，是人类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出自于资本主义毛孔的深刻理解，可以成为增进相互了解的源泉，而不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基础。在世界探索“大同”之际，马克思丰富的智慧遗产可以为东西方建立共同语言 and 了解共同面临的任任务做出显著贡献。

参考文献

Allen, G.C. and Donnithorne, A., 1957, *Western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and Malaya*, London, Macmillan

Avineri, S., 1969,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sat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Avineri, S., 1968,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an, P.,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gchi, A.K.,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le, A., and G.C.Means, [1932],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Birdsall, N., 2011, 'The (indispensable) Middle Cla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The Rich and the Rest, Not the Poor and the Rest',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Washington DC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2009, *Wealth markets in China: Delivering the Right Value Proposition for China's Wealthy*, Beijing,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reman, J., 2009, 'Myth of the global safety net', *New Left Review*, No. 59

Breman, J., 2013, *At Work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of India: A Perspective from the Bottom Up*,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ke, E., [179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on, Pelican Books, 1968

Clark, L.G., 2000, *Pension Fund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e, G.D.H., 1993, *Introduction*, J-J.Rousseau

Conquest, R., 1986, *Harvest of Sorrow*, London, Hutchison

David, J.B., S.Sandstrom, A. Shorrocks, and E.N.Wolff, 2008,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UNU-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2008/3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BERR), 2008, *The 2008 R&D scoreboard*, London: BERR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BIS), 2010, *The 2010 R&D Scoreboard*, London, BIS

Drucker, P.F., 1976, *The Unseen Revolution: How Pension Fund Socialism came to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Engels, F., [1848], 'French rule in Algeria', *The Northern Star*, 22 January 1848, in Avineri, 1969

F.Engels, [1888], Preface to the English 1888 edition o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2

Engels, F. , [1893], Preface to the Italian edition o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2

Engels, F., [1892], Preface to the First English edi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1845, Panther edition, 1969, with Foreword by E.Hobsbawm

Frank. A.G.,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Friedman, T., *The World is Flat: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6

Hegel, G. F, 1952,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nglis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182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 2002, *Decent Work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Geneva, ILO

Marx, K., and F. Engels,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2

Marx, K., and F. Engels, [1853],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in *Marx on China: Articles from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1853-1860*, London, Laurence and Wishart, 1968

Marx, K., and F. Engels, [1882], Preface to the Russian 1882 edition o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2

Marx, K., and F. Engels, 1961, *On the Paris Commune, (lun bali gongshe)*,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Marx, K., and F. Engels, 1974, *On the Paris Commu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 [1843], 'Critique of Hegel's Doctrine of the State', in Marx, 1975

Marx, K., [1867], *Capital*, Vol. 1, 1967 edi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Marx, K., [1871],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arx, 1974

Marx, K., 1881a, 'Letter to F.Domela-Nieuwenhuis in the Hague', in Marx and Engels, 1974

Marx, K., 1881b, 'Drafts and final version of a letter to Vera Zasulich', reproduced in full in Shanin, 1983

Marx, K., [1894], *Capital, volume 3*,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2

Marx, K., 1974,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Political Writings, Volume 3,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 1975,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shall, Alfred,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originally published 1890) (1920 edition)

- Means, G.C., 1930, 'The diffusion of stock ownership in the U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 44, pp.561-600
- Milanovic, B., 2007, '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 in D.Held and A.Kaya, eds., *Global In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 Minns, R., 1996, 'The social ownership of capital', *New Left Review*, Sept/Oct, pp. 42-61
- Nolan, P., 198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Far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Nolan, P., 2003, 'Adam Smith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free market economy', *Challenge*, 46(3): pp. 112-123
- Nolan, P., Jin Zhang and Chunhang Liu, 2007,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and the Cascade Effect*, Basingstoke, Palgrave
- Nolan, P., 2007, *Capitalism and Freedom: The Contradictory Character of Globalisation*, London, Anthem Press
- Nolan, P., 2009, *Crossroads: The End of Wild Capitalism*, London, Marshall Cavendish
- Nolan, P., 2012, *Is China Buying th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icketty, T., and E. Sasz, 2012, 'Top incomes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Recent Evolu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MF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 8-9 November
- Polanyi, K.,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Hill
- Prahalad, C.K., 2004,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Ross, A., and B. Scott, 2011,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NATO Review*, 17 November
- Rousseau, J-J., 1993,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Everyman edition, London
- Schlosser, E., 2013, *Command and Control*, London, Allen Lane
- Seabright, P., *The Company of Strang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Sessions, J., 2011, *By Plow and Sword: France and the Conquest of Algeri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hanin, T., 1983, ed.,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Smith, A., [1761],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edition (revised edition) (1982)

Smith, A.,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nnan edition (1976)

Tett, G., 2013, 'Insane financial system lives on post-Lehman', *Financial Times*, 13 September

Therborn, G., 197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No 103, May-June

Towers Watson, 2010, *The World's 500 Largest Asset Managers*, New York, Towers Watson

Turner, A., 2013, 'Credit, money and leverage: What Wiksell, Hayek and Fisher knew, but modern macro-economics forgot', Stockholm,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Wang, Lixiong, 2008, *China Tidal Wave*, London, Oriental Globa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in 1991 as *Yellow Peril (Huang Huo)*.

Warren, B., 1980,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World Bank, 200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07,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1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Zasulich, V., 1881, A letter to Marx', in Shanin, 1984